

田结庄邦光上海游记之我见

周保雄

2011年5月,在日文研和复旦日本研究中心共办的《江南文化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聆听了陈正宏先生的《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及其与沪人笔谈资料》,钦佩之余,我发现在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中还能挖掘出不少独特价值。与此同时,窃以为尚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拙文权当拾遗补阙,以期抛砖引玉。

一、缘起

拜读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先生的大作《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及其与沪人笔谈资料》,十分佩服陈先生的考据功夫。陈先生的“意外”发现,却仿佛是沙里淘金,从散页般的原始资料中挖掘出了田结庄邦光上海游记的诸多历史价值。

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玄武洞文库”主要收藏与田结庄邦光本人相关的资料,田结庄邦光的中国游记主体是《游履痕》四卷,以日记形式记载了田结庄氏在明治二年游历上海和武汉的经历。陈先生的论题较长,却切中要害,因为《游履痕》是田结庄日记的原本,尚未付梓,尤其是该文库“还藏有一批田结庄邦光在华期间与上海、武汉两地士绅笔谈的原稿。这批笔谈原稿均为散页,纸幅大小不等,笔者所目见的数量,已近七十页,实际现存的恐怕更多。它们在‘玄武洞文库’中均以《在清中笔谈集》和《在清中交友资料》为题归档,尚未得到充分的整理。”¹这些资料可以与《游履痕》互相参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游履痕》不仅是未刊稿,可能还是田结庄氏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手稿。把这批资料统归为“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及其与沪人笔谈资料”来加以考察,能够更贴切地接近田结庄在上海的真实感受,解析出其有关见解。

读罢陈先生的大作,尚觉意犹未尽,发现在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中还能挖掘出不少独特价值,故不揣简陋,略陈己见,以求方家斥正。

二、正名

据我所知,日本不少资料,如:多种人名辞典等,一般都把田结庄邦光称为田结庄千里,本文姑且从之。陈先生的论文(以下简称陈文)脉络清晰,首先介绍“田结庄邦光(1815-1896)原名秘,字必香,后更名邦光,字齐治,别号千里,大阪人。”然而,朝日新闻社的《朝日日本历史人物事典》田结庄千里条为“讳邦光,通称斋治。”讲谈社数码版《日本人名大辞典》为:田结庄“名邦光,通称齐治。”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的玄武洞文库为田结庄千里后人捐赠,中之岛图书馆于2003年6月15日至6月28日为该文库举办展览:《玄武洞文库展一幕末、

¹ 陈先生论文《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画家田结庄邦光的上海游记及其与沪人笔谈资料》。

明治时期大阪之伟才田结庄千里的足迹》，文库展对田结庄千里的简介为：“阳明学者、画家、炮术专家，亦是实业家的田结庄千里，名秘·駉，通称斋治，幼名不动次郎·元吉，字必香·邦光，号千里。”

这位大阪之伟才究竟是叫田结庄斋治还是田结庄齐治，似乎莫衷一是。2008年3月，日本朝日广播公司职员田结庄斋治因为在新干线上露阴猥亵女乘务员而遭起诉，此事件曾被日本许多媒体报道过，当然，露阴癖田结庄肯定不会是那位大阪奇人，但《游履痕》的作者是否会为此多了一层扑朔迷离？

陈正宏教授是版本学专家、校勘古籍的著名学者，他所依据的是田结庄氏的手稿原件，得出的结论自然可信度最高，可谓一锤定音。我特意查看了“玄武洞文库”中的一些影印件，比如说田结庄千里自撰的《概略履历书》、池部弥一郎颁发给田结庄的高岛流炮术“免許状”等，里面的田结庄均作“齐治”。《读墨痕》的内封落款也是如此。特别是《概略履历书》中既有“先人但马天民号椿斋”，也写明“齐治文化乙亥四月四日生”，可见田结庄本人对“斋”、“齐”两字是区别使用的，没有混为一谈。不过，明治十二年（1879年）出版的沈宗骞著、田结庄评点的《芥舟学画编》却作“田结庄斋治评”，当时田结庄氏尚在世，可见早在那时已经产生了舛错。

一字之误貌似细微差错，但可能误人子弟。1987年，凡人社曾刊行一本日语新闻听力教程——《ニュースで学ぶ日本語》，由堀歌子、三井丰子、森松映子根据《朝日新闻》的一些报道编辑而成。可能是编者为简便起见而大开方便法门？书中把江户时期的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简写成了“葛饰北齐”，这对鼎鼎大名的北斋略显不恭，但尚能以同音通假之类的理由加以搪塞，可惜某中译本却越发离谱，竟然把它翻译成了葛饰北齐，恐有遗人笑柄之嫌²。

三、田结庄氏中国之行的原因初探

对于田结庄千里中国游记的整部资料，因为未遑窥得全豹，尚无法确实查明其中国之行的直接动机。但据陈文介绍：“在田结庄邦光此番游历过程中始终相伴，自然也成为其在上海短期生活重要向导的，是一位在《游履痕》中被称为‘韦氏’的美国人。”这位韦氏把田结庄千里从日本带到中国，又带回日本，之后其姓氏又常与吴虹玉等人的名字一同出现在《游履痕》中，因此，陈先生推测：“他很可能就是曾任中日联合教区主教的韦廉臣（Bishop C.M. Williams）”。

查考《游履痕》本文记载：

有程泌者，以儒为业，来访，乃以字言曰：“此地有一位吴虹玉先生，到过花旗国八九年，然未知贵国言语，兼之此先生事多繁杂，故特着晚生时刻前来请候。”（《游履痕》卷一第六叶）

可见吴虹玉与田结庄并不认识，也不懂日语。吴虹玉并非孟尝君养士无数，他究竟是何缘由要派程泌前去料理田结庄氏在沪的生活事宜？而田结庄氏除了上海外还去了武汉，自武汉返回上海后，又直接“次吴家”（《游履痕》卷四第五叶）。田结庄氏回东瀛之前，吴虹玉

² 南开大学出版社《日语新闻听力教程》1992年，223页。

还“设别筵”饯别（卷四第十三叶）。归国当日，吴虹玉又亲自把田结庄氏送至船上，为其“周旋调度”（卷四第十三叶）（引自陈文）。如此关怀备至，除了是奉命行事，恐难以有其他解释。那么，吴虹玉遵从何人之命？那人是否就是韦廉臣呢？

韦廉臣（1827-1910）其人非同等闲，他于185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圣公会神学院，旋即来上海传教。他一到上海从第4天起，每天接受9小时的特训来学习汉语，一年半后不仅掌握了中文日常用语，而且能用汉语布道。1866年，韦廉臣被任命为中日联合教区主教³。1869年，他致力于开拓武昌与大阪地区传教，是日本圣公会第一任主教，也是横滨山手圣公会、立教学院的创始人。吴虹玉原就读于上海王家码头教会学塾，1853年，他被选拔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参加过南北战争，回国后从事教会工作，是美国圣公会在华最早的信徒和牧师之一。1873年，他与丁介生一起被韦廉臣主教按立为会吏，“在孙罗伯年休时，由吴虹玉代为处理江湾教务。”⁴作为韦廉臣的手下，奉韦廉臣之命行事属于理所当然。

那韦廉臣为何要把田结庄千里从日本带到中国，又带回日本？我推测这与韦廉臣在中日两国开拓教区有关。开拓教区不仅需要传教士传教，也需要其他人脉，因为开辟教区就要建立据点，这既需要当地政府的许可，也需要资金买地建房。招徕教众也非常容易之事，异国传教还必须学习当地语言，这一切都得倚重当地知名人士。

田结庄千里是位奇人，既精通儒道阳明学，又钻研炮术、从事实业，其交游广泛，财力殷实，祖父又是学习荷兰医学的医生，这些条件极其符合帮助韦廉臣开拓教区之需。而从田结庄氏在华的行踪来看，与韦廉臣的传教路线颇为一致，再从他在华所接受待来看，接待者大多是看似与田结庄毫不相干的圣公会教士，是韦廉臣的手下。除了吴虹玉，田结庄日记中屡屡出现的还有黄近霞和丁介生等人。黄近霞即黄光彩，是美国圣公会在华第一位受洗者和华籍牧师，曾长期担任美国圣公会在华最古老的教堂——上海虹口救主堂的牧师，他与吴虹玉、颜永京并称为圣公会华人三先驱。陪田结庄游历江湾的丁介生也是圣公会的重要人物，他与吴虹玉两人于1873年一起被韦廉臣主教按立为会吏，之后协助汤霭礼处理上海旧城耶稣堂的事务，并在旧城东门及其附近开拓巡回传教区⁵。

根据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教务评估报告和中外情势，除了以上海为根据地，韦廉臣主教“决定以武汉地区作为圣公会官话教域的教务发展中心。”⁶1868年（同治七年）6月，韦廉臣主教一行三人乘船至武汉，设礼拜堂于武昌县华林，这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传教活动之肇始。“明治二年（1869年）与米人韦氏游清国”（藤泽南岳所撰《千里先生碑》）。田结庄先到上海后赴武汉，《游履痕》卷三、卷四就是以武汉为主体的日记，其行程与韦廉臣主教的行踪颇为吻合。

美国圣公会中国传教的一大策略就是兴学储才，1869年，韦廉臣主教赶赴武汉，其中一大任务就是筹建教会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文华学院⁷。韦廉臣到了日本也是沿袭这一策略，如：创建立教学院（即后来的立教大学）。田结庄关心物价，其中有一项竟然是英语学费（参见

³ 大江満『宣教師ウィリアムズの伝道と生涯—幕末・明治米国聖公会の軌跡—』刀水書房、2000年、256頁。

⁴ 林美玖《施约瑟主教与圣公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调适》，《东华人文学报》2002年第2期，73頁。

⁵ 同注4，73頁。

⁶ 同注4，49頁。

⁷ 同注4，55頁。

陈文物价表)，估计和外国人学习外语有关，更可能与兴学传教有关。

《游履痕》卷一、卷二以上海为主，日记中田结庄着墨浓重地描写了虹口和江湾等地的游历，而那里都有圣公会的重要设施。从武汉返沪后，他又于十月初二“与黄近霞泛江进城，谒圣庙”，“过普育堂”，并“终至黄近霞家”（《游履痕》卷四第七叶至第八叶）。这里的“圣庙”恐怕未必就是孔庙，而普育堂却是圣公会所建。

耐人寻味的是田结庄抵沪当日就游赏了美利坚花园及其临近之桥。陪同者是“到过花旗国八九年”（《游履痕》卷一第六叶）的吴虹玉。陈教授独具慧眼，一下子便识别出来所谓的“美利坚花园”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外滩公园。外滩公园建于1868年6月，它前后曾用过多个名称：公花园、外国花园、公家花园、大桥公园、外摆渡公园、黄浦滩公园等等，英文名字为Public Park，它怎么会被田结庄叫成美利坚花园呢？当时那里的租界是英美租界，到了1899年才改称公共租界，若是那样，也应把公园称为英美花园才是呀。估计一个原因是导他而游的吴虹玉，包括田结庄身边的人士多是美国圣公会的，田结庄可能是先入为主，就以为公园也是美国式的。另外也可能美国圣公会所属中国差会与英国国教教会所属的英行教会曾发生传教区行政教域分界纠纷⁸，相互间不仅有矛盾，也有利益冲突，比如，在武汉，由于汉口当时已是英国伦敦会、循道会的传教中心，美国圣公会进军武汉只得武昌为中心。现在把外滩公园叫做美利坚花园，能显示美国圣公会势力之强大，也许能抵消英国势力的影响。但上述观点尚待进一步研读田结庄的原文，寻找出强有力的佐证。

就如其墓碑上所刻：“传道不传己”⁹ 韦廉臣以传教为重，不愿别人关注其个人生活，他重病返美之前，把和自己相关的资料、信件统统付之一炬，如此看来，田结庄的日记也就成了研究韦廉臣的重要资料了。

四、《游履痕》、《在清中笔谈集》和《在清中交友资料》的独特价值

日本的近代中国游记为数众多，多达数百余部，其中既有汉文游记也有用日文撰成。《申报》曾称：“日东文豪某，携著书千卷，为中土山水游。”¹⁰ 这位“文豪”便是冈千仞，他把中国见闻写入《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成为日本近代中国游记的佳作。冈千仞对局势、文艺等方面的见解远胜于田结庄，汉文文笔之优美亦不可以道里计。冈千仞在中国交游颇广，见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文廷式等官绅名流，但他自视极高，难免有些酸腐。田结庄游记的结构不如下藤朝太郎的《支那的社会相》¹¹ 那么章法分明，后藤的著作分天篇、地篇、人篇三大部分，从思想倾向、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各行各业等方面来加以论述。那么，与众多的中国游记相比，田结庄游记的特点何在？

陈文认为：“田结庄邦光所记近代上海见闻诸事，虽然在中国和西方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就绝对年代而论，所记如此真切、生动和具体，而时代又如此早的，却不多见。因此作为研究近代上海的第一手资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这确实是真知灼见，但田结庄千里究竟如何“真切、生动和具体”地表现出他在上海见闻诸事，比之其他旅华游记，他的表

⁸ 同注4，70页。

⁹ 参见立教大学HP「建学の精神について」。

¹⁰ 冈千仞《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中华书局，2009年，20页。

¹¹ 後藤朝太郎『支那の社会相』雄山閣、大正15年。

述又有何特色呢？本文尝试小结如下。

1. 图文并茂:田结庄千里中国游历的日记名《游履痕》，副题“支那纪行”，共四卷，内首叶有“藤泽南岳先生序 朱笔评点”，日记卷前有田结庄氏自序。

《游履痕》不仅结构完整，而且物证俱呈，既有自撰的《留别上海诸友》，也有在武汉所得张世准所赠诗文挂幅。张世准（1823-1891）曾官至刑部员外郎，后弃官从艺，诗画俱佳，属于一代名士。附其所赠诗文，既能作为标榜，也可证明所言非虚，尤其是书后附上田结庄氏自己所摹《长江大观图》一卷，不仅点明他游历了长江上的两大重镇—上海和武汉，气势恢宏的画意和细致入微的文字观察，恰恰是《游履痕》有别于其他日本学者游记的一大特色。

2. 一事二稿给我们的意外之喜:如同前述，除《游履痕》四卷外，玄武洞文库内还藏有一批田结庄在华期间与上海、武汉两地士绅笔谈的原稿。这批笔谈原稿均为散页，纸幅大小不等，尚未得到充分的整理，只是以《在清中笔谈集》和《在清中交友资料》为题归档于文库，但这恰恰反映了田结庄千里游记的形成过程。这类史料颇为罕见，它能够比较细致地反映出田结庄如何把自己的见闻加以文字表述，也为我们研究中日之间的文化沟通提供了绝好的研究素材。

陈文对比《游履痕》和《在清中笔谈集》、《在清中交友资料》的相关文字，认为田结庄氏的中国游历日记，即据当日零散的笔谈原稿整理而成。陈先生援引了田结庄千里在上海和卖大兴陶壶贩子交涉的情形。它在《游履痕》中是出自八月初八的日记，记录了其在上海和卖假的陶壶贩子交涉的情形——

下午，担壶老来，乃让曰：“日前买取之红泥壶二个，用腻腊伪附滑泽，你欺心欺人，其罪不小小。余精布拂拭，光泽渐消，注水则器不濡，是伪泽之证也。昨日有贵客辱临，看案头有此壶，言曰：在城门口买之，一双值钱八十文。余既买销之，今让你，更非讲价之何如也。昂廉固不论，尔有欺人之罪，你将何以谢其罪？你今日所担之物色，以异常减价销售。不然，则你当堕泥黎地狱！”老颜色失常，逡巡而去。（卷二第四叶至第五叶）

相同的情形亦见于《在清中笔谈集》（一）：

日前所买红泥瓶二个，用腻腊附饰滑泽，你欺心欺人，其罪不小小。余以别布拂拭，光滑渐消，注水不受，是伪泽之证也。昨日有贵客辱临，看案头有此瓶，说在城门口买之，一双值八十文云。余既买之，今更非论减价也。价贵廉固不论，你有欺人之罪。今日宜谢罪，以格外减价。不然，你当堕泥黎地狱。

陈文认为：“两相对照，可见《在清中笔谈集》为原稿，《游履痕》卷二所载为经过修饰的文本。”而且，“从《游履痕》前后各卷不同日期日记的书体不尽相同，且稿中行间及天头地脚偶有修改痕迹看，日记似非田结庄氏归国后誊清，而应该是他在华期间逐日或隔数日整理书写的。”据此可见，《游履痕》虽已定型，但仍在不断修改润饰之中。这一方面反映出田结庄的汉语写作水平远逊于冈千仞等汉学家，难以一气呵成，但田结庄的记述也不同于日本作者用日文写就的中国游记，它视角独特，别具风味。

用上述买陶壶之例进行分析，日语中的“瓶”对应着两个读音，一为かめ，意思与“甕”相同，另一个读音为びん，与“罍”可互换，但作为置于案头之物，田结庄把《在清中笔谈集》中的红泥瓶改写成《游履痕》中的红泥壶，这既可以看到田结庄注意到了日语汉字与中

文同形未必同义，从“瓶”到“壶”也可以看出由俗到雅的过程。而田结庄把“余以别布拂拭，光滑渐消，注水不受，是伪泽之证也”改成“余精布拂拭，光泽渐消，注水则器不濡，是伪泽之证也”，既去除了“光滑渐消”的不流畅表述，“精布拂拭”比“以别布拂拭”更为精当，把“用膩腊附饰滑泽”改成“用膩腊伪附滑泽”，效果类同前例。而将“价贵廉固不论”润色成“昂廉固不论”，是因为昂廉本身就指价格。

与冈千仞等汉学家的汉文游记相比较，田结庄的汉语写作口语特色较为明显，比如，日文中无汉字“你”，而无论是《游履痕》抑或《在清中笔谈集》，田结庄都用过不少“你”字。《在清中笔谈集》中有“价贵廉固不论，你有欺人之罪。今日宜谢罪，以格外减价。不然，你当堕泥黎地狱”，而在《游履痕》中则成了“昂廉固不论，尔有欺人之罪，你将何以谢其罪？你今日所担之物色，以异常减价销售。不然，则你当堕泥黎地狱！”增加了第二人称“你”，汉文更加流畅，而“尔有欺人之罪，你将何以谢其罪？”中“尔”与“你”并用，意思相同，却显示出修辞功夫。文采凸现，这也说明田结庄在不断润饰其文字。

应丁介生之邀，田结庄千里曾往江湾游历。田结庄在七月十三日的日记如此记载：

晴。丁介生来访。午刻，同行于江湾。从上海北门，足路二里而不足，土人曰十二里。（《游履痕》卷一第十八叶）

田结庄是商人，精于数字，他又钻研过炮术等，能绘制西洋兵器设计图，对尺寸大小自然十分敏感。他所谓的“足路二里而不足”的“里”应该是日本的长度，包括日记中表示长度的“间”、“町”等都是日本的长度单位，日语中的一里等于3.9273公里，而中国市制的一里则是500米，将日本的“足路二里而不足”换算一下则大约相当于“土人曰十二里”了。曾有人把小说家国木田独步的《竹栅门》（1908）中“電車の停留所まで半里以上もある”误译成“到电车站有半里多，”¹²可见田结庄当时就已发觉“里”字在中日中文中的差异。

游记也有多处可以看出其汉文功底不深的破绽，比如“你欺心欺人，其罪不小小”，这个“其罪不小小”日本味道相当浓郁。“就中如邦俗，张鬢发，耳后至项之发左右齐栉，而束形如舟首，以紧括拗于前而为髻者，盖风流新式也。”（卷一第八叶）中的“邦俗”，虽然古汉语中早已有之，如汉代光武帝时桂阳太守卫飒整饬属地，“期年间，邦俗从化。”（《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第六十六）¹³，但在近现代，“邦俗”应是颇有日文腔调，就如同常见的“邦译”。

土人始见日本人，看者如堵，喋喋杂沓，颇厌之。乃把扇书示曰：“你们视依，以为异乎？你以为异，则依亦以你为异。兽之尾在于后，你尾在于顶。”（《游履痕》卷一第十八叶）

里面的“依”显然是日语中的“わし”。尽管李白的《横江词》有“人道横江好，依道横江恶”，这里的“依”也是指“我”，但在中国近现代，“依”一般都作“你”解。这段文字也透露出，田结庄不仅结交文人雅士，与“土人”也有不少接触，既有砍价，也有问路，甚至还有恶语调侃。

田结庄既与韦廉臣等洋人相交，也不乏鄙视洋人之处。他与吴虹玉游历虹口时，见“路

¹² 高宁、张秀华编《日汉互译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107页。

¹³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影印，1984年，862页。

头马车捷速，蛮奴乘而汉奴御，来往如栉。（《游履痕》卷一第六叶）”，其中的“蛮奴”、“汉奴”就含鄙夷之意。

3. 成书时间早，史料价值高：日本人撰写的中国游记大多成书于明治后期、大正和昭和时期，尤其以昭和时期为最，而田结庄的日记写于明治二年，时间较早，书中记载了我国当时的一些经济生活数据，史料价值高。

田结庄在抵沪当日，即由吴虹玉陪伴，游赏了“美利坚花园”。不知吴虹玉是否真的陪同他入园，因为就是这位吴虹玉，曾于1885年11月25日与人联名上书工部局，抗议公园设“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如果入园，则可能是公园方面起初并没有规定，或有规定但没有严格执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相比之下，冈千仞的《观光纪游》也提及外滩公园：“大江当前，坡陀迤迳，花卉斓斑，为胜游之地。门置警卒，以中人垢污，大损园观，禁入观。”¹⁴ 语词华丽，但除了记述了外滩公园曾禁止华人游园外，元甚新意。

“出园行二三町许有桥，桥上并装槛，在外者为常套，在内者形作弧背。（《游履痕》卷一第六叶）”但这桥并非是现在的外白渡桥。“美利坚花园”的大门最早开设于公园西北角，近韦尔斯桥头。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韦尔斯桥东面修建木结构的外白渡桥，后来在木桥旁修建钢结构大桥，这才是留存至今的外白渡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园方将大门迁至公园西南，也即如今园门所在位置。

陈文根据田结庄七月一日所记：“此地江水常黄，不可饮，井水亦污。有卖水家，用矾而澄之，以鬻，户户沽之，以供饮用。又有贮冰家，豪门沽之，以为饮用。或供热天取凉之用（《游履痕》卷一第七叶）”，证明当时上海已普遍使用饮用水。查考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网站的相关资料，据称上海第一家水厂始建于1875年，1880年成立英商上海自来水有限公司，1883年正式供水，而这之前的城市用水确如田结庄所言。田结庄还发现“有贮冰家”贮冰供富人热天取凉之用，但究竟是土法制冰还是当时已经进口有少量制冰机？这有待详考。田结庄的游记不仅纪实，也引人思索，这也应该是该游记的价值之一。

五、结语

田结庄的中国游记留下不少他与上海、武汉两地士绅笔谈交游的佳话，也是记载当时上海风土人情的实录，颇具历史价值。游记本身也可以成为研究中日文化差异的一个对象，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

¹⁴ 同注11，72-73页。